



胡悦晗
著

生活的逻辑

城市日常

世界中的民国知识人

(1927—1937)

Logic of Life

Intellectuals
in the
Daily Urban Worl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胡悦晗 著

生活的逻辑

城市日常

世界中的民国知识人

(1927—1937)



Logic of Life

Intellectuals in the

Daily Urban Worl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生活的逻辑：城市日常世界中的民国知识人：1927—
1937 / 胡悦晗著. --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8. 8

ISBN 978 - 7 - 5201 - 2242 - 9

I. ①生… II. ①胡… III. ①知识分子 - 研究 - 中国
- 1927 - 1937 IV. ①D693. 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027652 号

生活的逻辑：城市日常世界中的民国知识人（1927—1937）

著 者 / 胡悦晗

出 版 人 / 谢寿光

项目统筹 / 李丽丽

责任编辑 / 李丽丽 肖世伟

出 版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近代史编辑室 (010) 59367256

地址：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100029

网址：www. ssap. com. cn

发 行 / 市场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18

印 装 / 三河市尚艺印装有限公司

规 格 / 开 本：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26.5 字 数：420 千字

版 次 / 2018 年 8 月第 1 版 201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201 - 2242 - 9

定 价 / 98.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读者服务中心 (010 - 59367028) 联系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本书受到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研究项目（项目批准号：13YJC840015）和杭州师范大学人文社会科学振兴计划优秀著作出版项目资助

目 录

绪 论	001
第一章 民族国家叙事中的都市想象	027
第一节 民族国家叙事中的“文明”与“文化”	030
第二节 “文明”：上海的都市想象与北京“他者”	036
第三节 “文化”：北京的都市想象与上海“他者”	043
第四节 “文明”上海的娱乐生活与“文化” 北京的“回收”生活	049
小 结	065
第二章 职业、居住与消费：知识群体的阶层位置	067
第一节 民国时期上海、北京的“城”与“人”	070
第二节 职业、收入与声望：知识群体的职业分层	079
第三节 居住空间分异与社会分层	098
第四节 四合院、洋房与公寓楼：居住空间与阶层分化	121
第五节 上海知识群体的消费分层	125
小 结	132
第三章 日常交往与社会关系网络建构	135
第一节 朋友、同事与家人：以私人空间为视角	137
第二节 茶社、酒楼与咖啡馆：以公共空间为视角	164
第三节 “礼尚往来”：以物质文化为视角	179

第四节 牌局、宴请与清谈：北京知识群体的家庭生活·····	195
小 结·····	198
第四章 精神生活与阶层认同·····	203
第一节 书房、阅读与写作：以私人空间为视角·····	205
第二节 图书馆、书店与书摊：以公共空间为视角·····	228
第三节 书籍的购买、消费与收藏：以物质文化为视角·····	244
第四节 图书馆、书房与琉璃厂：精神生活与阶层认同·····	259
小 结·····	266
第五章 生活方式与身份认同·····	269
第一节 服饰品味与身体观·····	272
第二节 疾病与疼痛·····	286
第三节 游乐空间：舞厅、弹子房与回力球场·····	300
第四节 流动空间：漫步、出游与旅行·····	313
第五节 公园、茶馆与影戏院：北京知识群体的闲暇生活 与身份认同·····	332
第六节 生活想象与身份认同：以《生活周刊》为 例的分析·····	339
小 结·····	353
结 论·····	359
附录 沧海一“叶”：大历史中的小家庭 ——评 Joseph W. Esherick, <i>Ancestral Leaves: A Family Journey through Chinese History</i> ·····	367
人名索引·····	385
参考文献·····	389
“破”与“立”之间的不断切换（代后记）·····	404

绪 论

— 问题缘起

所谓最好的时光，指着一种不再回返的幸福之感，不是因为它美好无匹从而我们眷恋不已，而是倒过来，正因为它永恒失落了，我们于是只能用怀念来召唤它，它也因此成为美好无匹。^①

唐诺在解读侯孝贤的电影时，一语中的地道出了怀旧作为一种文化行为所具有的建构特性。就本质而言，怀旧是作为“对于我们失去的历史性，以及我们生活过正在经验的历史的可能性，积极营造出来的一个征状”。^②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都市悄然涌动着一种浓重的怀旧情调。民国日历、月份牌等大量民国遗物的出现标志着一股复古潮流的形成。^③ 这股风潮逐渐涵盖城市生活的各个层面，以“老上海”“老北京”两个现代中国最具象征性的大城市为主旋律的文学及影视作品相继问世，从日常生活层面勾勒出1920—1930年民国“黄金十年”的城市图景。然而，怀旧的历史并非历史真实。对上海而言，城市文化的复调特性使得李欧梵眼中的“摩登上海”与卢汉超笔下的“霓虹灯外”都只是上海五彩斑斓的城市生活中的一个面向。Christopher Howe 指出，几乎所有关于中国重要生活面向的严肃分析最终都必须面对上海，

① 唐诺：《最好的时光——阅读侯孝贤》，《万象》2006年7月号。

② 〔美〕詹明信：《电影：对于现在的怀旧》，氏著《后现代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吴美真译，台北，时报文化出版公司，1998，第354页。

③ 〔美〕史书美：《现代的诱惑——书写半殖民地中国的现代主义（1917—1937）》，何恬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序言，第3页。

面对上海在中国的特殊地位。^① 民国北京^②的城市文化也绝非小说家与评论家眼中的“民国范”一般优雅、单调。在董玥看来，民国时期北京的战乱与长期贫困使居民只关注眼前最根本的生存利益需要，在这个意义上，他们没有抛弃过去，而是将过去当作一种可供利用的资源。^③ 民国北京并非人们眼中的“故都”，而是一个不断从传统向现代嬗变的城市。

中国现代知识群体自萌芽伊始，就与城市密不可分。“现代知识群体与传统知识群体的最大区别之一，是他们从乡村走向了都市，在现代都市空间中聚集在一起，以都市的公共空间和文化权力网络作为背景，展开自身的文化生产、社会交往和公共影响”。^④ 城市的基础设施、知识环境、关系网络给知识群体的精神赋予了足够的营养，大大地刺激了他们的精神活动。知识群体时常挂在嘴边的却是“反城市话语”，他们的话语和他们的现实生活是矛盾的、乖离的。^⑤ 他们一方面离不开现代城市生活的声、光、化、电，另一方面则在道德伦理上更偏向传统乡土世界。生活世界与精神世界之间的张力使对这个群体的考察具有持续不断的阐释空间。

在郁达夫眼里，五四运动的成功“第一要算‘个人’的发现”。^⑥ 五四时期是个人主义风靡的时期。李欧梵把五四时期归纳为一个史无前例的自我与社会、个人与整体的对立时期。^⑦ 许多学者认为，肇始于晚清的中国现代知识群体经历了五四时期的个人主义思潮后，到20世纪30年代，开始以知识阶层的整体形象出现。张灏指出，1895—1925年的“转型时代”有两大变化：一是报纸杂志、新式学校及学会等制度性传播媒介的大量涌现；二是

① Christopher Howe, *Shanghai: Revolution and Development in an Asian Metropoli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p. 6.

② 1928年，国民政府设立北平特别市，1937年，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改为北京，但未得到承认。为行文方便，本书统一以北京称之。

③ Madeleine Yue Dong (董玥), *Republican Beijing: The City and Its Histories* (California: California University Press, 2003), p. 307.

④ 许纪霖：《都市空间视野中的知识分子研究》，《天津社会科学》2004年第3期。

⑤ [日]山口久和：《中国近世末期城市知识分子的变貌——探求中国近代学术知识的萌芽》，高瑞泉、山口久和主编《中国的现代性与城市知识分子》，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第4页。

⑥ 郁达夫：《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王自立、陈子善主编《郁达夫文集》第6卷，花城出版社、香港三联书店，1983，导言，第261页。

⑦ 李欧梵：《中国现代文学与现代性十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第20页。

新的社群媒体——知识阶层的出现。^① 许纪霖认为，20 世纪 30 年代前后，中国开始形成一个以受过国内外大学的高等教育并拥有现代大学文凭为标志的半封闭的知识精英阶层。^② 在余英时看来，到 20 世纪 30 年代，中国知识界已形成共识：“士”或“士大夫”已一去不复返，代之而起的是现代知识人，知识人代“士”而起宣告了中国知识阶层传统形态的终结、现代形态的形成。^③

然而，这一概括性论述因缺乏微观层面的实证分析、佐证而稍显笼统。分层研究一个隐含的前提是，其所研究的社会已经是处于相对稳定的定型状态。^④ 1927—1937 年的中国社会处于一个相对稳定的发展阶段。五四时期以“原子化”状态存在的知识人如何被镶嵌进一个逐渐秩序化、分层化的社会，已有研究缺乏深入探析。学界对阶级阶层问题的观点不一，更为探究此问题增加了难度。撇开阶级与阶层划分的学理纷争，1927—1937 年城市知识群体是否已经构成了一个从自在走向自为的阶层，这一问题本身就值得商榷。尽管这一时期上海、北京两地的知识群体具备阶层的某些整体特征，但其内部差异同样不容忽视。以往此一时期的北京知识群体因依附于国家建制化的高等学府这一事实而被定义为“京派文人学者”，但晚近的研究也注意到京派知识群体内部的分化。^⑤ 这一时期的上海，现代传媒与出版业，水平参差不齐的公、私立大学以及各种新兴行业所吸纳的知识群体因其在职业、经济收入、社会地位等方面差距甚大，更加给人以鱼龙混杂、五花八门之感。如此复杂面向的城市知识群体已经构成一个阶层了吗？

然而，就此否定城市知识群体已经构成一个阶层，又太过武断。上海知

① 张灏：《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转型时代》，氏著《幽暗意识与民主传统》，新星出版社，2006，第 134 页。

② 许纪霖：《近代中国的“知识人社会”》，许纪霖主编《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公共交往》，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第 13 页。

③ 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新版序，第 5 页。

④ 孙立平：《从分层到阶级：中国社会结构分析模式的转换》，香港《二十一世纪》2007 年 2 月号。

⑤ 董玥将 1927—1937 年北京的知识分子分为来自南方、在北京各教育机构任职或就读的新式知识分子和一批民国时期生于斯、长于斯的北京地方知识分子。参见胡悦晗、翟清菊《“回收”：日常生活视角下的空间秩序、生活经验与城市想象——评 Madeleine Yue Dong, *Republican Beijing: The City and Its Histories*》，《史学理论研究》2011 年第 1 期。

识群体置身于国内意识形态斗争、帝国主义势力、充满诱惑力的城市物质生活和文化世界主义相互交叉的关系网络中，而所有这些因素都共同构成了他们的主体性结构。^①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继创造社掀起的“革命文学”取代了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文学革命”后，文学开始作为社会与阶级动员的工具，文学的阶级性被广泛讨论。“我们的艺术是阶级解放的一种武器，又是新人生观新宇宙观的具体的立法者及司法官。”^② 这一时期的上海新闻记者成为具有自我意识的自由职业者，并成立自己的职业团体，为争取言论自由采取行动；上海的大学教授作为一个群体在建立职业社团和采取集体行动方面成长尽管相当缓慢，但在1927年相继成立了“上海各大学教授协会”与“上海各大学联合会”。^③ 而在南京国民政府执政后，由于国民党政府对北京的政治控制力较弱，北京的文化与学术依然有着较为自由的生存空间。依托于稳定的学院体制和优渥的生活条件，这一时期的北京吸纳了大批游学海外的知识精英。他们通过创办同人杂志、组织文化沙龙等形式聚集起来。在中国现代学科体系划分还未完全定型的20世纪30年代，北京知识群体可以超越学科、单位的界限，依据相近的政治态度、学术取向甚至生活品味形成不同的群体或社团，这种现象对于20年代建立在地缘、师承等基础之上的知识群体圈子而言，已经有了不小的变化。^④ 上述现象表明，中国现代城市知识群体的阶层建构与分化，受意识形态、籍贯与地域差别、情感私交、生活方式与品味以及职业、收入与地位等多重因素影响。这些因素并不相互排斥，而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身处其中的个体，在多种因素交错的综合作用下，逐渐倾向于某个特定群体，甚至游刃于多个群体之间。已有研究多从政治环境、社会制度及思想文化等层面考察知识群体认同感形成的过程。这些研究均因过多停留在社会及观念方面的论述而缺少从日常生活的微观经验

① [美] 史书美：《现代的诱惑——书写半殖民地中国的现代主义（1917—1937）》，第269页。

② 冯乃超：《怎样地克服艺术的危机》，《创造月刊》第2卷第2期，1928年9月。

③ 参见徐小群《民国时期的国家与社会——自由职业团体在上海的兴起（1912—1937）》，新星出版社，2007，第255—313页。

④ 王建伟：《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北平的文化格局（1928—1937）》，《安徽史学》2014年第5期。

世界提供更加具有穿透力的解读。^① 因此，暂时搁置“上海、北京知识阶层是否已经形成”这一难以证实或证伪的问题，在民国时期城市社会分层的背景下，引入历史社会学的视角与方法，考察1927—1937年城市知识群体是否具备阶层构成的基本条件，管窥知识群体在日常生活的层面如何构建身份认同感，或许更有意义。

日常生活如何进入历史书写，是生活史学者面临的共同问题。蒲慕洲指出，西方的日常生活史研究存在两种取向。

第一类采取全面描述一时一地人们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的方式，企图给读者一个有关当时人生活的图像。……第二类作品，则是以日常生活中某一特定的问题为中心，重视生活情境背后的文化心态，设法从这一问题在时间中的发展看出文化性格的常与变，并且设法与该社会的整体结构取得联系。^②

上述两种取向风格各异，但其共通点在于，更加注重政治、经济、社会等宏观结构内的历史细部。当所有的历史书写都是围绕着民族国家的意识与危机展开时，思考的轴心就都是特定的历史事件。在这样一个自觉的历史书写中，日常生活被遮蔽了。^③ 日常生活进入历史书写，首要的问题是使原先被遮蔽在民族国家叙事中的历史细节浮出水面，进而将原先习以为常的历史论述以批判反思的方式重新问题化，推动研究深入。

从日常生活角度考察阶层建构，既具有深化知识群体研究与城市生活史研究的学术意义，也具有现实意义。20世纪中国的革命话语通过批判当下的日常生活来承诺社会美好的前景；革命目标被演绎成一种乌托邦式的美好

① 例如，舒衡哲指出，国民党的威权镇压强化了知识分子的“共同体”意识。只有当“白色恐怖”的受难者不再是1927年被杀的不知名的共产主义组织者和工人，而是自己共同体成员时，知识分子才有可能团结起来，光明正大地为维护他们的共同信仰而奋斗。参见〔美〕舒衡哲《中国启蒙运动——知识分子与五四遗产》，刘京建译，新星出版社，2007，第236页。

② 蒲慕洲：《西方近年来的生活史研究》，台北《新史学》第3卷第4期，1992年12月。

③ 唐小兵：《从日常生活的碎屑上拯救历史》，《中华读书报》2004年6月9日。

理想境界，这种美好境界鼓动着更多的民众投入革命的洪流之中。^① 为了未来的理想社会，必须牺牲现在的日常生活。然而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转型，使得“革命”意识形态淡出社会生活领域，人们开始迎接一个以满足当下欲望与需求为目的，以各种物质与感官消费为主要内容的世俗时代的到来。在这个新时代里，长期掩盖在“革命”理想主义光环后的“日常生活”重新走进人们的世界。以日常生活为视角，考察民国时期城市知识群体的阶层建构过程，既有助于推进知识分子史与社会生活史的学术研究，也有益于鉴往知来，反思当下。

二 文献回顾

本书以知识群体为研究对象，以日常生活为研究领域，故与本书相关的已有研究多集中在日常生活史与知识群体研究两个层面。中国日常生活史研究长期以来一直作为社会史分支之一的社会生活史范畴。按研究方法划分，经历了清末民初时期的民族风俗志式描述阶段、民国时期的经济—社会史研究阶段、20 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新经济—社会史研究阶段及当前在多学科交叉的趋势下走向独立化与多元化的四个发展阶段。早在 20 世纪之初就有学者开始关注日常生活领域。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指出，“匹夫匹妇”的“日用饮食之活动”，对“一社会一时代之共同心理、共同习惯”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他在拟定“适合于现代中国人所需要之中国史”的提纲时，专门设有“自初民时代以迄今日”的“衣食住之状况”部分。^② 但这一时期的日常生活研究，多是民族风俗志式的简单描述，其背后大都隐含作者本人的文化倾向。民国以降，西方社会学开始在中国受到普遍重视，以燕京大学为首的一批高校及研究机构纷纷开设社会学专业。中国的第一代受西方社会科学系统训练的学者与西方的社会学家一起深入田野，进行详细的社会调查研究，产生了一批将

① 刘永丽：《被书写的现代——20 世纪中国文学中的上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第 171 页。

②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第 2—5 页。

西方理论与中国本土实践相结合的开创性研究成果。这也使得日常生活史研究摆脱民族风俗志式的描述，日益受到经济—社会史方法的影响，开启了日常生活史研究的第二个阶段。从历史学角度而言，这些研究强调历史场景必须与基层生活的实际场景相参照，文本必须经受文化实践的检验，但这些研究受美国人文区位学的影响，强调对某个社区的内部结构进行个案式的分析，突出对地域单位的把握。^①这也使得这些研究多侧重于基础调查统计工作而非宏观分析概括，其呈现的中国农村社会“被割裂成为彼此孤立或隔离的家族、人口、婚姻、宗教、风俗、传统、文化传播一类具体社会表象，而无法把那些作用在这一切表象背后的共同社会根源发现出来”。^②

20世纪80年代以来兴起的区域史研究涌现出一大批以江南为研究重点的成果。这些论著多从区域研究的角度考察明清及近代的社会经济转型导致的市镇兴起与工商业发展，并将城市作为一个生活场域，进行社会史研究。^③刘志琴首开风气，讨论商品流行对城市社会风气变化的影响。^④如果说民国时期的日常生活史研究对农村及城市都有涉及，则这一时期的研究开始侧重面向城市，大体上集中于政治中心与商业中心重叠的城市，考察主要依靠市场供应的消费结构与社会风尚变迁之间的关联。进入90年代，海内外一批新经济—社会史学者延续了民国时期日常生活史研究的传统，在日益微观化与地域化的趋向，对中国古代与近代社会生活进行结构性描述

① 杨念群：《中层理论——东西方思想会通下的中国史研究》，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第39—40页。

② 王亚南：《社会科学论纲》，东南出版社，1945，第64—65页。

③ 相关论著主要有：王家范《明清江南市镇结构及其历史价值初探》，《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84年第1期；何荣昌《明清时期江南市镇的发展》，《苏州大学学报》1984年第3期；许敏《士·娼·优——晚清上海社会生活一瞥》，《史林》1992年第2期；常建华《论明代社会生活性消费风俗的变迁》，《南开学报》1994年第4期；王翔《明清商品经济与江南市民生活》，《郑州大学学报》1993年第3期；孟彭兴《明代商品经济的繁荣与市民社会生活的嬗变》，《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94年第2期；张德昌《清季一个京官的生活》，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70；吴智和《明清时代饮茶生活》，台北，博远出版有限公司，1990；等等。

④ 刘志琴：《晚明城市风尚初探》，台北《中国文化研究集刊》第6期，1984年3月。

与分析。^①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多学科的日渐交叉融合，不仅开启了日常生活史研究的第四个发展阶段，也使其呈现出三大变化。第一，在经济—社会史研究多年的实证积累基础上，日常生活史研究日益转向社会史与文化史相结合的研究方法，通过描述社会表象考察背后的文化意涵。^② 谢和耐以南宋都城临安（今杭州）为例，从社会状况、衣食住行、生命周期、四时节令、消闲时光等方面描述了当时的社会生活，并展现了唐代尚武、好战、组织严明的社会渐变为宋代活泼、重商、享乐和腐化的社会的过程，这两个时期的共同特点在于农民的贫困和生活的不安定，而且这种贫困还在与日俱增。^③ 王尔敏从明清时期庶民阶层的民间信仰、日常生活节奏、饮食医药、游乐才艺等不同方面考察其文化生活中承载的世俗文化传统，认为其具有固守文化传统的旧制性的同时又有充分的自主性和参与性；不是依靠学校的训练学习，而是由心传口授，互相传习而成；其游乐活动场所不定，设备用具就地取

① 相关论著主要有：慈鸿飞《20 世纪二三十年代教师、公务员工资及生活状况考》，《近代史研究》1994 年第 3 期；裔昭印《从家庭和私人生活看古雅典妇女的地位》，《历史研究》2000 年第 2 期；胡俊修《“东方芝加哥”背后的庸常——民国中后期武汉下层民众日常生活研究（1927—1949）》，博士学位论文，华中师范大学，2007；王敏《严复的私人生活》，《档案与史学》2003 年第 5 期；葛涛《照相与清末民初上海社会生活》，《史林》2003 年第 4 期；Susan Naquin, *Peking: Temples and City Life, 1400 - 1900*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0); Michael Loewe, *Everyday Life in Early Imperial China: During the Han Period 202 BC-AD 220* (Mass.: Hackett Publishing Company, 2005); Charles Benn, *Daily Life in Traditional China: The Tang Dynasty* (Santa Barbara: Greenwood Publishing Group, 2002); 等等。

② 相关著述主要有：罗晓翔《城市生活的空间结构与城市认同——以明代南京士绅社会为中心》，《浙江社会科学》2010 年第 7 期；姚颖《清代北京市井文化中的休闲尚趣之风》，《北京社会科学》2007 年第 3 期；魏泉《“青鹤”研究——三十年代上海旧式文人的生存和创作空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2 年第 1 期；张国刚《“立家之道，闺室为重”——论唐代家庭生活中的夫妻关系》，《清华大学学报》2008 年第 1 期；陈江《明代中后期的江南社会与社会生活》，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陈弱水《唐代的妇女文化与家庭生活》，台北，允晨文化公司，2007；宋德熹《美丽与哀愁——唐代妓女的生活与文化》，氏著《唐史识小——社会与文化的探索》，台北，稻乡出版社，2009；巫仁恕《品味奢华——晚明的消费社会与士大夫》，中华书局，2008；熊秉真编《睹物思人》，台北，麦田出版公司，2003；李孝悌《恋恋红尘——中国的城市、欲望和生活》，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李孝悌编《中国的城市生活》，新星出版社，2006；蒲慕洲编《生活与文化》，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5；等等。

③ 参见〔法〕谢和耐《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刘东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

材、价值低廉，而技艺却巧夺天工等共同特色。^①

第二，随着近年来新文化史研究在海外的兴起以及逐渐引入国内，日常生活史研究也日益受其影响。有别于经济—社会史范式对日常生活的结构性描述与分析，新文化史范式不企图构建日常生活的全貌，而是将日常生活视为一个场域，关注点则在认同、建构、表象等问题，其核心是追问历史建构中的权力因素。因此，越来越多以“日常生活”为名的新文化史研究毋宁说是以日常生活为背景的研究。这是其与经济—社会史研究的最大不同之处。卢汉超、王笛、韩起澜、高彦颐等一大批海外学者以交叉学科理论，聚焦社会中下阶层，考察国家、地方政府与社会各阶层之间在日常生活场域中的交错互动，不仅深入情绪、感觉等个体经验层面，并且可对“传统与现代”“专制独裁”等以往历史命题做重新解读。^②

第三，由于传统经济—社会史研究仍在持续，日常生活史的研究对象从中下层群体拓展至职员、自由职业者、学生、医生等其他社会群体。美国学者叶文心与上海学者施扣柱都致力于考察近代上海学生生活。叶文心从民国时期上海与北京的国立大学、教会大学与私立大学的校园生活切入，考察民国时期政治与文化在日常生活中的体现。施扣柱对近代上海新式学堂学生群体的学业生活、体育生活、日常生活等常态生活的几个侧面做了细致论述。

① 王尔敏：《明清时代庶民文化生活》，岳麓书社，2002，第180—181页。

② 相关论著主要有：〔美〕韩起澜《苏北人在上海（1850—1980）》，卢明华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美〕顾德曼《家乡、城市和国家——上海的地缘网络与认同（1853—1937）》，宋钻友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美〕杨晓山《私人领域的变形——唐宋诗歌中的园林与玩好》，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王笛《街头文化——成都公共空间、下层民众与地方政治（1870—1930）》，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王笛《茶馆：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观世界（1900—1950）》，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连玲玲《日常生活的权力场域：以民国上海百货公司店职员为例》，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55期，2007年3月；Catherine V. Yeh, “The Life-style of Four Wenren in Late Qing Shanghai,”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vol. 12, 1997; Zarrow, Peter Gue, *Creating Chinese Modernity: Knowledge and Everyday Life, 1900–1940*, New York: Peter Lang Ltd., 2006; Knapp, Ronald G., Lo, Kai-Yin, *House, Home, Family: Living and Being Chinese*,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近年美国的中国研究也屡见以近代中国日常生活为选题的博士论文。主要有：Andrew David Field, “A Night in Shanghai: Nightlife and Modernity in Semi-colonial China, 1919–1937”, Ph. 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2001; Mark S. Swislocki, “Feast and Famine in Republican Shanghai: Urban Food Culture, Nutrition and the State”, Ph. D. dissertation, Stanford University, 2001。